

● 明清史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

田 龄

(青 岛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 山 东 青 岛 266071)

[作者简介] 田 龄 (1968-), 女, 陕西西安人,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经济史研究。

[摘 要] 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了长足发展, 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这一时期蚕桑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8 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 18 世纪后, 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太湖地区; 蚕桑业; 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 (2004)03-0328-05

明清时期的太湖地区, 包括杭州、嘉兴、湖州及苏州、松江、常州 6 府, 这里气候温暖, 降水充足, 地势低平, 水网密布, 自然条件优越, 自唐代以来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蚕桑养殖区之一, 生产历史悠久。明清时期,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迅猛发展, 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区。

明前期, 棉花栽培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 正如明人邱浚所说, 棉花在明代“其种乃遍天下, 地无南北皆宜之, 人无贫富皆服之”(《大学衍义补》引自《农政全书》卷三十五)。随着棉花生产的普及, 棉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渐渐普遍, 而丝绵和丝织品也逐渐被棉布所取代, 这就意味着蚕桑业生产的衰落。从明初到明朝中叶, 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在社会安定、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的条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 正如万历时嘉兴府石门县人蕲一派所说: (太湖地区)“迎来四境, 无警, 休养生息, 民皆力农重桑, 群治荒秽, 树桑不可以株数计。”又说这里“无闲塘, 上下地必植桑, 富者培壅茂美, 不以亩计, 贫者数躬之地, 小隙必栽”(光绪《石门县志》卷七 风俗)。从当时的地方志和其它文献资料来看, 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 所以家家植桑, 户户养蚕。

当时太湖地区蚕桑生产最兴盛的地区主要是湖州、嘉兴、杭州和苏州的部分地区。杭嘉湖地区除了个别山乡外, 蚕桑生产十分发达。湖州是蚕桑最盛之地, “尺寸地必树之桑”(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九 风俗)。万历时人董份说, 这里“(桑)树艺无有遗隙, 蚕丝被天下”(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物产)。嘉兴府“公私仰给, 惟蚕务是赖, 故蚕务最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杭州府“桑麻弥望”, “男务农桑, 女务纺织”。太湖北部的苏州府的蚕桑生产以吴江、吴县的生产最为发达, 吴江县“居民悉逐绫绸之利”, “植桑特盛”(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卷五 物产), 因而有“蚕桑盛于两浙”的说法。吴县“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 凡女未及笄, 即学育蚕, 三四月谓之蚕月, 家家闭户, 不相往来”(崇祯《吴县志》卷十 风俗)。由于产量太大, 本地消耗不了, 于是“蚕时设市, 湖南(嘉兴、湖州)各邑皆来贩鬻”(乾隆《太湖考备》卷六 风俗·物产)。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兴盛可见一斑。

由于蚕桑业在当地农业生产中成为头等大事, 以致“民以蚕为田, 故谓胜意皆饶, 失事则坐困”, “生

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 蚕桑)。“蚕或不登”,农户“举家辄哭,盖农家全视蚕以为耕耘之资,蚕荒则田荒,揭债鬻子,惨不免矣”(乾隆《海盐县续志卷二 食货篇》)。因此“胜以则增裕,失手则坐困”,反映出蚕桑业已在当地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村落也因周围地区蚕桑业发达,带动了缫丝织造业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兴市镇和丝织品集散地。如湖州府归安县的菱湖镇,“洪武初始设务司,建社坛,……成弘间,庄第连云,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遂成为归安雄镇”(同治《菱湖镇志》卷二十二 舆地略·村镇)。杭州的塘栖镇,“遍地宜桑,春下间一片绿云,剪声梯影,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为生殖大宗”,因而成为“岁计食货,无虑数十百万”的大镇(光绪《塘栖镇志》卷十八 事纪)。其它名镇如南浔、濮院、双林、王江泾也都是太湖以南地区蚕桑业和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与嘉兴、湖州接壤的太湖以北的苏州府吴江县情况也大致如此。有学者统计,明弘治以前,吴江全县只有7个镇,而嘉靖、万历年间,共有10个村庄发展成为市镇。在这些新兴市镇中,又以震泽和盛泽两镇最为有名。震泽在“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而“绌之业,惟郡人(苏州)为之。明熙宣年间,邑人始渐事机织,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还绌绸之利”,居民“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倍之,而又过焉”(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物产)。盛泽镇原名“青草滩”,顾名思义,原本是一个相当荒芜的地方,明初是个只有五六十户的小村庄,嘉靖年间成市,“镇上居民稠广,但以蚕丝为业,男女勤织,经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明中叶后,“市上两岸绸丝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聚,拥挤不堪”(乾隆《吴江县志》卷一 疆土志)。由于蚕桑业的兴旺和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江南大运河),盛泽一跃发展成为太湖边上重要的丝织手工业基地和丝绸集散地。嘉兴、湖州和苏州三府所产的丝和丝织品都销往这里,以致“罗纱绸缎出盛泽,衣被遍天下”。“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为市,舟楫塞港,街道摩肩”,“如一都会矣”。到明末,盛泽已成为“烟火万家”的著名丝织业专业市镇。太湖地区的松江、常州两府虽染及邻近地区植桑养蚕的风气,也有些蚕桑活动,但均属于零星生产,与其它地区差距很大。

清代,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继续发展,生产区域进一步扩大,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清初,太湖地区的蚕桑业仍以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最为发达。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南巡,曾由江南大运河去杭州,途经苏州的吴县、吴江和嘉兴的吴兴、桐乡和崇德等地时,运河两岸一望无际葱茏茂密的桑林,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禁感慨地说:“朕巡浙西,桑林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①

从18世纪开始,由于欧美商人来华搜求生丝和丝织品的逐渐增多,以及后来新丝厂的大量建立,丝茧和丝织品的市场需求大增。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4府的蚕桑业虽然兴盛,但所生产的丝茧和丝织品却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种桑养蚕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从事蚕桑生产的农人日众,再加上各地官吏的倡导,太湖地区的蚕桑业便以这4地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浙西的长兴、嘉善。这里地接嘉兴,18世纪以后,蚕桑业也日趋发达,此外,和吴兴相邻的安吉县,同治年间,“迎来山乡亦皆栽桑”(同治《吴志》卷十一 风俗)。蚕桑业生产区域得到进一步扩大,苏州府的昆山、新阳、常熟、昭文等地生产也有了明显进步,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在昆山、新阳两地,“旧时邑鲜务蚕者,妇女间有蓄之者”,同治时“巴江廖纶摄新阳事,教民蚕桑,设公桑局,贷民工本,四无年后,邑农植桑不妨农事,成为恒业”(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八 物产);常熟昭文在乾隆以前还是“丝,西乡育蚕所出,品质略逊于嘉湖”,同治时却是“桑、各处俱栽,比前倍增”,“丝,近年所出浸多,岁值十数万”的情况了(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四十八 物产志)。

太湖北面江苏的常州和松江的蚕桑业也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以常州府无锡、金匱两县兴起最早,发展也最突出,但在同治前这两县只有开化一乡蚕桑业生产较为发达。这两县用大片土地栽桑,估计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曾任山西按察使的严紫卿,在其卸任回乡后,即买地树桑。他在自订年谱中说:“同治十年(1871年)置农具,买耕牛,种田三十亩,并购桑秧三千株,排种屯前之南湾,为一方开蚕桑风气之生。”从此,栽桑养蚕在这里风靡一时,“人多植桑养蚕,缫茧奇美,其风始

盛,延于诸乡。”^②许多地主富农甚至将稻田改成桑田,以致影响粮食生产,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现象。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蚕务讲习馆派技师松永伍作来华考察,他到无锡后,在所写的观感上说:“自苏州到无锡,一望无际皆桑也,……枝叶繁茂,可为惊羨。”(《农学撝第六册》)无锡、金匱两地的蚕桑业的发展也影响到常州府其它各县,这些地方的蚕桑生产也开始陆续发展起来。无锡北面的江阴县,蚕桑业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发展。同治七年(1868年),当地人吴恒首先从湖州购买湖桑数百株在江阴试种,据他自己说:前去参观学习的“自旦至晚,庭前若市”(吴恒《农桑捷要文书》自序)。次年(1869年),知县汪厚坤设蚕会,购湖桑教民种之,然而“其时育蚕者少,未善其用。嗣有邑人吴孔彰著《农桑捷要》一书广劝种栽。光绪初年,苏宗振、钱维錡特辟桑田若干亩,租桑者免租3年,限满纳租,并酌量轻减”。于是种桑养蚕在江阴迅速发展起来,桑田面积迅速扩大,到了民国初年,江阴已有桑田10多万亩(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一 物产)。蚕桑业生产基础较好的宜兴、荆溪、武进、靖江等地,这时的生产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宜兴、荆溪两县丘陵面积大,不十分适宜蚕桑生产,但当地人民还是利用为数不多的平原遍野植桑。同治七年(1868年),武进知县张清华提倡蚕桑,在无主的荒地上种植公桑上万株,并把养蚕缂丝的工具陈列在县衙的庭院中,供百姓观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蚕桑业生产。靖江县的妇女颇善于养蚕、浴丝,所织之绸与湖绸、杭绸不相上下。另外,如苏州府的长洲县,旧时因多种棉花,蚕桑业生产活动甚少,但因其西北境与无锡接壤,受其影响,光绪之季,“乡民见其利溥,率相栽桑饲蚕”,“田野中亦有十亩闲闲之象”(民国《吴江县志》卷五十 輿地考)。

松江地区本是全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中心,植棉业和棉纺织业发达,素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其“邑人向来弹力木棉,不兴蚕事。”种棉纺纱织布是这里农家的主要副业和经济来源,农人很少再有余力兼顾蚕桑业生产,所以对此少有讲求,“间有饲蚕者,亦无大熟”(嘉庆《松江府志》卷六 疆土志)。光绪年间,由于受与其相邻的嘉兴和杭州兴盛的蚕桑业影响,加上农民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巨大经济收益,松江府的娄县、南汇、上海、金山、奉贤、华亭等地的蚕桑业也有一定发展。如娄县南部地接嘉兴,因而颇擅植桑。上海县,在光绪初,“沈秉诚著《农桑辑要》劝种桑后,西乡多栽种成林”,“光绪十五年,丝厂渐多林立,乡民饲蚕者渐多。丝之用渐广”(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八 物产)。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量浙西和江宁乡民为避战乱来到浦东,仍沿袭他们旧有的生产习惯,植桑养蚕,遂开南汇蚕桑生产之先河。光绪年间,“罗嘉杰、金福先后官斯土,课民育桑而导以桑之利”,南汇的许多地方得以树桑遍地(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 卷二十 风俗·物产)。但总的说来,由于生产历史短,松江地区的蚕桑业生产与太湖流域的其它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总的看来,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呈现出以杭嘉湖苏地区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扩大和发展的状态。为什么在其他地区蚕桑业逐步衰落的同时,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呢?究其原因,主要有4点:

首先,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商品性农业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扩大,水稻小麦豆类等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显著提高。太湖地区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农户将生产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加上这里又是明清时期赋税最重的地区,人民生活压力大,因此,经济规律在生产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农民纷纷采取以副养农、以工养农的自救措施,以维持生计,“故虽赋重而不见民贫”(乾隆《江苏通志》卷六十八 食货志·田赋)。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蚕桑业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此外,在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的前提下,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商品市场扩大,一些专业性经济地域逐步形成。太湖地区也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了全国性的蚕桑业和丝织业专业生产中心。同时,随着其它地区蚕桑业的逐步衰落,使得太湖地区生丝及丝织品的商品市场需求扩大,这里的丝及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行销到全国各地,南到广东、福建,北到河北、山西,西北到陕西,西南到四川、贵州、云南,几乎全国都能见到太湖地区生产的生丝和丝织品。

第二 太湖地区是我国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繁盛、赋税最重的地区,人多地狭,人地矛盾突

出, 百姓生活负担沉重。杭州府洪武二十四年人均土地 3.01 亩, 乾隆四十九年人均仅为 1.01 亩; 湖州府洪武二十四年人均土地 3.6 亩, 乾隆二十一年为 1.05 亩; 嘉兴府洪武初人均土地 3.5 亩, 乾隆三十四年则为 1.58 亩; 嘉庆二十五年, 苏州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 1073 人^③, 这样的人地比例, 就全国而言也是极其罕见的。人口多, 劳动力充足, 有利于发展生产, 然而, 在阡陌生齿日繁的同时, 人口增长大大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 致使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按照当时的亩产量, 极少数丰产度最好的田“亩收四五石”, 一般的“田极熟, 米每亩三石”, 或“上农丰岁亩可得二石五斗”或“亩收以石米为准……农勤则倍收”, 平均每亩的产量在正常年份均在二石左右(《补农书》《补〈农书〉后》)。扣除税粮之外, 明初尚有余粮, 明中后期加上“春花”(即小麦豌豆)凑合, 已难卒岁, 入清后则大亏所需。原来的粮食输出区成了输入区。明清之际, 嘉兴府“每岁不能自给, 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康熙《嘉兴府志》卷十 风俗)。湖州府常赖客米接济, 杭州府更是产不敷食, 客米三日不至, 城中便有挨饿之虞(乾隆《平湖县志》卷一 风俗)。苏州府也是“田亩少, 户口增, 岁如不足, 恒藉川湖之运”(同治《苏州府志》卷五十二 风俗)。后来粮食不但从湖广、四川、广东和福建运济, 甚至有从外洋来的。“苏湖熟, 天下足”已成为美好的回忆, 整个太湖地区缺粮现象日趋严重, 更不可能还有余粮外输。

人多地少, 粮食短缺, 似乎应该扩种粮食作物, 实则不然, 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促使广大农户更加注重蚕桑业生产, 清末清初湖州人张履祥曾对种粮和种桑作过比较: “田壅多, 共亦多, 地工省, 壅亦省; 田工惧忙, 地工俱闲; 田赴时急, 地赴时缓; 田忧水旱, 地不忧水旱。俗云: 千日田头, 一日地头, 是已。”而种一亩地的桑树, “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 少亦四、五筐, 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 则蚕一筐, 即可当一亩之息。米甚贵, 丝甚贱, 尚足与田相准。”于是他得出结论: “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最好的年成种桑的收入比种粮高五六倍, 正常年份高两三倍, 最差的年景也不低于种粮。所以, 他又说, “种田利最薄”, 只是“化无用为有用”。一般农户未必有如张履祥这般精于计算, 但种桑省工省肥, 不忧水旱, 再加上种桑比种粮交纳的赋税少, 而获利数倍于种田,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农民自然会对种桑钟爱有加, 因为“蚕桑之利, 厚于稼穡。公私赖焉。蚕不或捻, 则公私俱困, 为困百倍”(《补农书》下卷 《补〈农书〉后》)。在明清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下, 农户既然可以通过养蚕售丝, 获取更多的收入, 以银易米, 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 自然会更加注重蚕桑业生产。

第三, 生丝及丝织品历来都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货物。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受到种种限制, 但生丝及丝织品仍是出口的大宗, 生丝及丝织品非常受国际市场欢迎, 需要量依然很大。太湖地区明清时期一直是生丝的主要出口地, 国外对生丝和丝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多, 也从一定方面促进了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发展。此外, 太湖地区所产的生丝除一直供应江浙织造之用外, 还一直是广东、福建丝织业原料主要的供应地, 清初开禁通海后, 福建和广东的丝织业得到了一定发展, 对太湖地区的丝织原料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这对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从 18 世纪开始, 国内外对生丝及丝织品的需求增长很快。乾隆二十四年, 外国轮船仅在广州一地贩运的湖丝及绸缎等货, 就由以前的 20 余万斤增至 30 多万斤, 价值白银 70 多万两(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三)。乾、嘉、道三朝对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生丝也经常保持在 20 至 50 万两白银之间。鸦片战争后, 生丝的出口没有下降, 相反却大幅度增长, 1853 年以前的 10 年中, 生丝年出口为 25571 包, 1854 年陡增为 61894 包, 以后逐年上升, 1862 年增至 88754 包^[1](第 544 页)。此时及后来, 外资和民族资本在国内设立的丝厂越来越多, 原料需求旺盛, 这些因素都刺激了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发展, 这一点在常州、松江的蚕桑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四, 太湖流域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 气候湿润, 灌溉便利, 平原面积较大, 发展蚕桑业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的发展, 与这里的人们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鸦片战争后, 上海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洋商可以方便地到内地销售产品, 也可以自由地到内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农副产品。新建丝厂也多以上海为中心, 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 6

府距离上海都很近,非常有利于生丝和丝织品的就近出口和销售。在蚕桑业的迅速发展中,这个地理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 释:

- ① 玄晖《桑赋·序》,引自 乾隆《杭州府志》,卷一《天章》
- ② 引自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三十一《物产》
- ③ 据康熙《杭州府志》,卷七《田赋》、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十四《田赋》、万历《湖州府志》卷五《田赋》、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六《田赋》、嘉靖《嘉兴府图志》卷九《田赋》、嘉庆《嘉兴府志》卷二十一《田赋》和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三《田赋·户口》的数字推算。

[参 考 文 献]

- [1]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 1 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2]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 李明珠. 中国近代蚕丝及外销[M]. 徐秀丽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4] 王社教. 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桂 莉)

Mulberry Indus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velopment

TIAN Ling

(Teachers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Biography: TIAN Ling (1968-), female, Lecturer, Teachers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history.

Abstract: The mulberry industry flourished in Taihu area while it declined in other region in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ulberry planting and silkworm breeding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ing activities of famers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ir income during that time. This paper gives not only a full introdu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mulberry industry but also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ulberry industry; Taihu area; commodity economy